

跟随胡愈之伯伯南洋逃难

汪雅梅

(二)



人皆为侨界名流，既有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马来亚共产党党员，也有中国国民党的人选。胡愈之作为报界人士(《南洋商报》编辑主任)被任命为宣传部部长，邵宗汉和唐伯涛分任副部长。唐伯涛是重庆国民党政府王大桢(王芹生)“国际问题研究所”办的《通讯》在新加坡的负责人。王大桢有“日本通”之称，以他为所长的这一研究所，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一个重点搜集日本情报的部门。唐伯涛是王大桢的湖南同乡，所以深得王的信任。胡愈之坚决执行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共同对敌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敌军大兵压境、飞机轰炸和炮击不断的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他却安排唐伯涛在仅能载20余人的一条小摩托航上，一起撤离。而另安排吴柳斯带领宣传部和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的其他工作人员杨骚、张企程、徐焦萌、林枫、刘漫、许侠、林瑾玉及吴柳斯

一家等20余人，随后与抗委会保T团部副主任黄亦欢等一起乘大船撤离，他们动身赶在新加坡陷落前只有6天，险些走不了。我们到达印尼会合后，因国民党政府同殖民统治者荷兰有外交关系，因此只有唐伯涛事先顺利拿到了荷兰领事馆的签证，得以转道印度回国，而其他人却因殖民当局的无理刁难滞留在印尼，度过三年零八个月的流亡生活，有人牺牲，有人病死。先是新加坡沦陷后，伪政权曾派人到印尼“邀请”十几位知名人士回去，名单上就有唐伯涛。李振殿、刘武丹等4人被“邀请”回新加坡后，即遭受酷刑，被监禁了4个月才交保释放。而另一位国民党人一一抗委会劳工服务部部长林谋盛因后来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被日军捕获杀害。唐伯涛得以幸免于难。胡愈之真心实意同党外人士共事交朋友，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例子。附带说明，我在历史资料里查到了唐伯涛

的生平:大革命时期曾在家乡加入共产党，并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委、组织部一等干事，1927年到南洋的中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财政部花纱布局专员，1946年底调到青岛，先后任中纺公司青岛分公司统计室主任、中纺九厂厂长;青岛解放前曾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参加护厂活动，解放后又在陈少敏同志的帮助教育下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在纺织系统担任重要职务;是山东省人大代表、山东省政协委员，1979年去世。联系这一段逃难的历史，不能不说胡愈之对他的影响和帮助，是使他站到人民立场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大家原计划从苏门答腊去爪哇寻船回国，但未能成行。不久，荷属印尼总督向日军投降，形势急转直下，风声日紧。胡愈之建议暂时分散隐蔽，我一家和王任叔、雷德容、杨骚躲到一座叫亚莱的小岛。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荆棘丛生，泥沼成片，野兽出没，瘴气弥漫，地上难以通行，满目蛮荒景象。岛上很少印尼土著，也只有两户华侨，我们即分住在两户华侨家里，王任叔在他的作品《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中对这里的环境记述甚详。我们

这家房东虽然对我们很热情，但岛上生活十分困苦，吃的是野菜和一种叫做“硕我”的薯类植物磨成的粉末:生活用水更是困难，井水有毒绝对不能饮用，河沟里的水也都由于长年浸泡腐烂树叶而发红，必须经过煮沸消毒后才勉强可用，积存的雨水则非常珍惜。我甫学会走路，就同长辈一起经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磨难，时常跟着小姐姐捡枯树枝当柴烧，生活的艰难过早地压在我们姐妹头上，连当地人也不敢说我们这两个瘦弱的小女孩能否存活下去。王任叔他们三人那边的情形也不比我们好，可是他在困难中还给我们姐妹送来一些米和钱。

日军追捕我们其急，许多逃来的难民都聚集在这一带，文化界人士目标太大，大家如果继续留下来很危险，再也难以隐藏。胡愈之是这些文化人中最受尊重的长者《他是中共特别党员，但只能以文化人的面貌出现，沈兹九、王任叔、雷德容、蔡高岗、郑楚耘也都是中共党员，先后来新加坡协助工作，但当时没有公开，他们之间也无组织关系)，从逃难开始就给大家出了不少好主意。胡愈之的意见是，为避免暴露身份以防不测，大家应

分批出走，西上苏门答腊内陆。大家议后认为，印尼海岸已为日军封锁控制，回国的希望渺茫，而苏西有一个小镇叫巴爷公务(Payakumbuh)，附近虽也有少许日本兵，但他们主要注意的是印尼人，同时当地华侨除个别人外并不十分了解我们的身份，对我们逃难者也十分同情和照顾，在这里落脚相对比较安全，可作安身权宜之计。于是大家决定到巴爷公务去。郁达夫、胡愈之、沈兹九、王任叔、邵宗汉、张楚琨、雷德容和张绿漪等先期到达那里，在当地打开了一定的局面。1942年9月间，汪金丁先独自赶到巴爷公务去会合，母亲带着我们随后也来到巴爷公务住下来。

为遮人耳目，他们大多在进入苏岛内陆即改取一个灰色的名字。除郁达夫化名赵廉外，胡愈之化名张尚福，后为金子仙、金芝轩，沈兹九化名赵氏，又用原名慕兰，张楚琨化名张止观，高云览化名高友庆，邵宗汉是赵德生、张德生，王任叔是何秀生，杨骚是杨笃清，王纪元是汪国材，汪金丁是汪福生，其他人的名字在此期间也屡有变动。所以，索隐解读这些化名是没有意义。

未完 下期待续